

影片，它的著

（Sullivan）似乎比

有些模倣一

的片名，并且

得奖的电视剧

同年

同幾乎所有在國

樣，陽光一片在國

却遭到了禁映的

它雖然是在上海

中沒有台灣演員參加

的原因，姜文至今沒

萬美元的貸款進行償還

款可以想見，有人

電影節上得獎的影片

等待，陽光終有穿破雲

KNOWING

知道

沈昌文口述自傳

沈昌文 口述

張冠生 整理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知道

沈昌文口述自传

沈昌文 口述 张冠生 整理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

沈昌文口述；张冠生整理.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4

ISBN 978-7-5360-5298-7

I. 知... II. ①沈... ②张... III. 沈昌文—回忆录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28851 号

责任编辑：秦 颖 文 珍

装帧设计：黄礼孩 林 娟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市星湖大道)

开 本 880×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6

字 数 120,000 字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沈昌文

秦颖 摄

沈昌文，1931年9月生于上海，1945年3月起在上海金银首饰店学徒。

学徒期间，工余曾在上海一些学校学习，最后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

1951年3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1986年1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后退休。

1980年3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任副主编、主编，迄1995年12月。

自承并非知识分子，但因在文化出版界执役多年，知道一些事情，因号称“知道分子”。

目录

contents

001	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
023	上了很多很多补习学校
043	在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生涯
067	从“反右”到“文革”
089	《读书》杂志创刊过程
119	当了三联书店总经理
151	附 录
177	后 记 / 张冠生

从板缝里 看这个世界

01

- ◎ 父上海，母宁波
- ◎ 家里穷得一塌糊涂
- ◎ 从板缝里看街景
- ◎ 好人家的孩子
- ◎ 有六年不姓沈，姓王
- ◎ 尽量假装家境不错
- ◎ 品学兼优的学生
- ◎ 因家贫辍学当学徒
- ◎ 猜灯谜显摆才智
- ◎ 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
- ◎ 和美国兵做生意
- ◎ 开始半工半读



我从念小学开始，就在人性扭曲的情况下长大。我连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我始终要仰仗别人的帮助。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我连自己的姓都得改掉。我不能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儿，因为我的祖母不允许，他们是她眼里的“野蛮小鬼”。正是在喜好玩耍的时候，我唯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这形成了我比较特别的经历，也促使我这个当学徒的永远要念书，要上进。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始终不跟荒废时间的事情打交道，只知道要多学一点东西，自己去找本领，找饭吃。现在想想，我唯一的玩儿，现在也还是这样在玩儿，就是从板缝里看这个世界。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

从我小的时候说起吧。

我是1931年9月26号出生的，生在上海开封路上我们家的老宅子。出生的时间据说是子时，一天中的第一个时辰。那天是阴历八月十五，后来我习惯过阴历的生日。

据说我的家庭曾经很富有，可是到我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

我父亲名叫沈汉英，小名叫宝囡，是上海人。他是一个大少爷，一辈子不做事的。我的母亲是宁波人，是开封路我家老宅的房客。我家在上海的祖居地据说是在大场，就是现在上海大学所在的

地方。

我的祖父早先大概就在大场一带讨生活，他去世的时间比较早，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在上海靠开饭馆谋生。饭馆有很多种，他开的那种在上海叫“包饭作”，专门给写字间送饭。当时上海有很多洋行、公司、写字楼，里边的工作人员要吃饭，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就应运而生。我祖父开的饭馆据说是规模比较大的，留下了一些家产。

我的父亲在小小年纪就成了小老板，但是家产在我的祖母手里掌管。

我祖母姓冯，是上海的本地人，从小生长在庙头这个地方，大概就在大场附近。

祖父去世后，家里剩下四个人，祖母、父亲和两个姑姑。父亲排行最小，祖母当家。但是按照旧时的规矩，重男轻女，父亲是独生儿子，要多加培养。祖母怎么培养他呢？这牵涉到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我和祖母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她亲口告诉过我，讲过多

旁白

沈先生 1931 年出生在上海，生活书店 1932 年创办于上海。其中像是有一份前定因缘。

生活书店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前身，由著名出版家邹韬奋创办。该出版机构以“促进大众文化”为己任，其所出版、发行的各类书刊内容涉及当时大众生活的诸多方面，推介倡导进步思想，传播普及科学知识，以极大热忱关注国计民生，逐渐成为当时中国出版业的先进。



六岁的沈昌文。

次,按照我们家的这种情况,应该叫我的父亲学着抽鸦片。

用我后来概括出来的话,叫“抽鸦片的孩子不变坏”。我问过祖母是不是这样,她说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呢?其中的道理就是:有产业的家庭里,能导致家产破败掉的行为,就是嫖和赌。在当时的社会里,孩子只要一抽鸦片,就不嫖不赌了,所以就要训练他们抽鸦片。我懂事后,还埋怨过祖母,为什么叫我爸爸抽鸦片呀?祖母说,你不了解,抽鸦片的孩子不嫖不赌,能保住家产。

我父亲怎么样呢?据说确实是不嫖不赌,可是家产没有保住。为什么呢?当时没有想过这些。现在想,原因很简单,家产要想保住,除了不败掉,还要经营管理。抽了鸦片的人,大概是不会去管理的。祖母说,我父亲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就是躺在烟榻上抽鸦片,不干一点坏事儿。可是,他也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情,他大概一辈子没

管过家里的事儿，据说就是这么一位大少爷。

到我三四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留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的就是我，女的是我的姐姐。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灵前哭。但是，他长的什么样子，我完全忘了，是靠照片知道他的长相的。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家的“包饭作”生意就衰败得不行了，家里欠下了很多债。欠多少呢？据说，用我们在开封路的房产抵债都还不够，也就是“资不抵债”。大概就是在1934年，我们家就逃亡了。我妈妈抱着我，到宁波；我祖母抱着我姐姐，到了烟台。

为什么她们要到烟台呢？我有两个姑姑。大姑姑一辈子抽大烟，跟着我父亲一起抽。她没有嫁人的兴趣，没有结婚。我不知道鸦片怎么能这么厉害，能叫人没有生存兴趣！她不成家，一直跟着妹妹一起过。二姑姑不抽大烟，正常结婚成家，二姑父在烟台海关工作，被认为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那时候的海关是英国人的，二姑父会讲英语，他在那里为英国人的海关工作，我祖母就抱着我姐姐去投奔了二姑姑和二姑父。

当时，我姐姐六七岁，我才三四岁。为了逃避债务，我们全家就实实在在地逃亡了。家里负下的债既然用房子顶不了，就宁肯逃走后让债主来把房子分掉，也不能自己败掉。那处住宅，我小时候压根儿就没有见过，长大也没让我去看。在宁波那段时间里住的房子，我记忆里倒是还有点印象。

我和妈妈到宁波后，就住在我妈妈的娘家了。这样生活的时间不长，我印象中，也就几个月吧。半年不到，我和妈妈、我祖母和

姐姐，就统统从烟台和宁波回到了上海。回不到原来的住宅了，就在我的二姑妈的婆家那里租了一处最蹩脚的房子。上海人把这样的房子叫做“棚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最大的一个功绩就是拆掉了这些“棚户”。

棚户式的房子，都是用木板钉成的。住到几个月的时候，木板就开裂了，板跟板之间也不接缝了。我记得，我七八岁的时候，住在棚户里的最大乐趣，就是躺在床上从板缝里看街景，或是一边做功课一边从板缝里看马路上的汽车，很高兴。那时候，家里不让我出去玩，我可以隔着板缝看见马路上的风景，看得很来劲。

这样回到上海以后，我就上学了，先是在棚户那个地方上小学。

为了进学校，我改了名字，也改了姓。我本名不叫沈昌文，家里为我起的名字叫沈锦文，我姐姐叫沈佩文。改姓名的原因有几个，一个原因是为了躲避债主追讨债务。同时，入学的时候，总要

旁 白

2004年5月22日上午，沈先生重访故地，来到上海市闸北区七浦路。阔别六十多年，他在这条路上找338弄20号，当年他从“板缝里看街景”的地方。

当年的棚户区，如今是上海最繁荣的平价服装贸易集市之一。鳞次栉比之状达到极致。街两边店门外挂出各式服装，路中央留出了仅容两人侧身通过的宽度。在如林的服装里左冲右突，终未找到338弄20号。

最后来到服装店背后的开阔地。大片瓦砾，拆了一半的棚户，远处的高楼，构成一幅新旧交替的图景。

在大片瓦砾旁
的老棚户区。60多
年后沈昌文回到他
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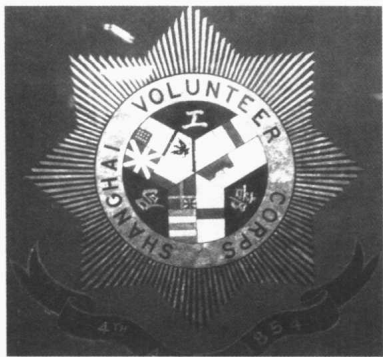


有个名字。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祖母主张我一定要进好学校，要进上海最好的学校，祖母这个主张对我的一生影响都非常大。

刚回上海的时候，我进了一个比较差的学校。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我已经不记得了，就在家的附近，现在的话叫“弄堂小学”。好像是宁波人办的学校，在学校里都讲宁波话。我能讲很好的宁波话。

我妈妈的家在宁波，是个商人家庭。我外祖父是个商人，他是我爸爸的开封路住宅的一个房客，他们就是那么认识的。我妈妈总结过她的生活，总跟我讲，尤其是逃亡到宁波以后，更是经常讲，从宁波回来以后就一直讲，一直讲到她死。她说自己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嫁了上海人。上海人不可靠，宁波人可靠。我以后差不多都做宁波人了。当然，我的生活经验也证明，宁波人的确跟上海人不一样。

宁波的有钱人，家庭教育里有一条，就是要孩子吃苦。家里再



工部局徽章。

英国人管租界的机构，上海人叫“工部局”，是借用清朝官职命的名。

有钱，孩子都要去学徒的。就是家里开了店，有现成的产业，孩子也要去学徒。必须吃上三年苦，然后再回自家的店里做小老板。对于没有吃过苦的人，是不可以把女儿嫁给他的。像我父亲那样，一开始就做小老板，在宁波人那里是不可想象的。我父亲没有做过学徒，没有吃过苦，只吃家产，不正经做事，导致坐吃山空，家里负债累累，祖母和妈妈逃亡。

妈妈非常遗憾当年没有遵守宁波人取舍标准的这一条，她一辈子吃亏就是因为嫁给了上海人。因此，我妈妈不大赞成、甚至很反对我和姑姑接触，她和我的祖母也有很尖锐的矛盾。对我妈妈来讲，我是唯一的根苗啊，她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她发现我祖母想要影响我的时候，就把我带到她在上海的宁波亲戚家里，不让我与上海人接触，还不断告诫我，上海人是如何如何的坏。

可是有一条，祖母和妈妈是一样的，就是给我的教育中经常强调：我们是好人家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进好学校。我们家附近有一所学校是非常有名的，叫北区小学。我的祖母反对我开始进的那个

弄堂小学，后来就想办法进了北区小学。

为什么叫“北区小学”呢？实际来说，它是工部局小学，是英国人办的学校。在上海，我们住的地方是在租界，而且是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管。英国人管租界的机构，上海人叫“工部局”，是借用清朝官职命的名。英文叫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意思是上海市政会议。英文名字听起来是非常的客气，可是实际上是个很有权势的地方。

工部局办了好多学校，是按地区办。我住的地方是在北边，所以叫“北区小学”。另外还有西区小学，等等。工部局办的还有中学，一所非常有名的中学是“育才中学”，还有一所“格致中学”，也很有名。这些都是工部局办的。工部局有一个机构，叫“华人教育处”，专门管这事儿。华人教育处有一个时期的头头非常有名气，是陈鹤琴先生，一位华人教育家。他好像在南京还办了一所师范学院，所以他在师资方面很有优势，可谓优良，他尤其重视英语教育，从小学开始就这样。

我的祖母坚持要我进北区小学。要进这个学校，学费很贵，家里负担不起，怎么办呢？我那位在烟台的二姑父姓王，他的哥哥或是弟弟是在工部局工作的。具体职务我不知道，我们叫“大写”，意思就是今天的“文员”。这种人的工作 in the office，你这屋子就叫写字间，在写字间工作的职员叫“大写”。我就假托是他的儿子，改姓王，一方面有利于入学，一方面也利于躲避债务。他的儿子辈的名字是以“昌”字排行，年龄跟我差不多，我就把原来的名字“锦文”改成“昌文”。我用“王昌文”这个名字，算是他的子弟，

进入了工部局的北区小学。所以，我有六年不姓沈，姓王。

我进这所小学后，又从一年级念起。第一年交了学费，从第二年起开始免费，就没有再交过学费。这所学校很好，地方很大，在上海很有名。这地方现在还在，当年叫“克能海路”。克能海是一个英国人名字的汉语译音。这个人好像是英国在上海的一个领事，用他的名字命名了那条路。我在这所非常讲究的学校读书，从1937年读到1943年。我很用功，功课非常好，读到第二年，就进入品学兼优的学生行列了，就是免费生了。

我的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我是假冒有钱人家的，实际上家里穷得要命。我的祖母又给了我一条规矩，或说是家教，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进了好学校，只准跟好学校的同学玩儿，不能跟我家住的那个地方的孩子们玩儿。对那些孩子，我的祖母叫他们是“野蛮小鬼”，不让我沾染他们的不良习气。

我住的那个地方，好多孩子的家庭情况都比我强，因为他们

旁白

当年的北区小学现在叫“上海市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位于康乐路（当年名“克能海路”）199号。

这些标志学校荣誉的牌子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中国教育学会‘十五’重点课题学校、社区推进学习型家庭实验基地”、“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实验基地”等。学校传达室外墙上悬挂的此类牌子还有：“文明单位”（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素质教育实验基地”（闸北区人民政府颁发）、“中国少年报社上海市学生记者站”等。

的父母都是贩夫走卒，当小商贩。我们家没有这样的收入，全靠我祖母和妈妈给人家当保姆。我妈妈整天出去当保姆，上海话叫“娘姨”，收入微薄得很。所以，我家住的地方比他们还差。可是我祖母的家教极严，说我们是好人家，不准我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从来不和居住地街道上的孩子们来往。到我小学毕业，我在那儿住了多年出来，有一点我很自豪，家里也老是称赞我，就是我从来不会骂人，不会说粗话，说话不带脏字儿。

大概每个地方都有一句很通俗的骂人的话，有些人就经常挂在口头上，比如北京话里的“操你妈”。上海话里也有这一类的，意思相近，被浑身流民习气的人挂在嘴上，平常说话总要带出来。比如说“你给我倒杯水”，他就说：“操！你给我倒杯水！”很多话，他都要加上一个“操”字，好像要表达某种情绪的时候一定要来个“操”。不“操”一下，他的高兴情绪或是愤怒情绪就出不来。我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话，没有这样的习惯。一个原因，就是我不和习惯这样说话的孩子们一起玩儿。

我的同学们基本上是富家子弟，他们上下学有些人都是有汽车接送的，日常的语言表达上也比较文明。我住在附近，不必接送，家里也没有车能接送。我和同学们从来没有讲过家里情况和他们不一样，但是在语言习惯上接受的是同一种文化气氛的熏陶。我很听家里人的话，只跟他们一起玩儿。大概我的“奴才主义”在那时候就开始养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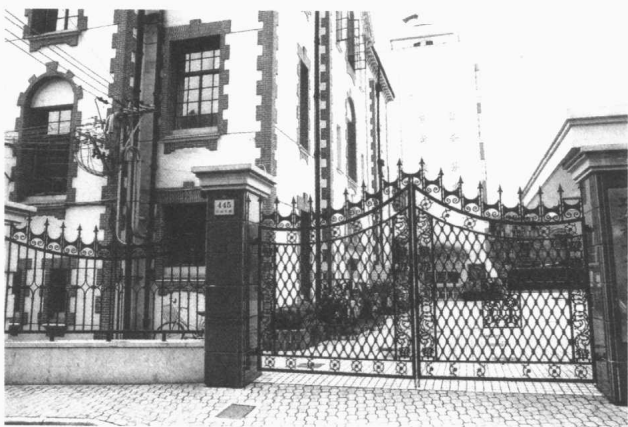
我的这个“主义”，日后帮助我避免出格，在党的领导之下没怎么犯错误。所谓“揭竿而起”、“拍案而起”这类本领和行为，

我从来没有过。所以，“反右”时没有被划右派，“文革”中也没有积极参加造反，等等。这是后话了。

和富家子弟们一起上学，一起玩儿，也有一个问题。他们家境好，我家境差，但是在外表上又不能显出太大差别，我就只能尽量假装家境也不错。

比如有一条，我在家都是穿中国式的衣服，包括衬衣什么的。进了北区小学，必须穿西式衬衣，我没有，家里也买不起。怎么办呢？我妈妈就连夜给我用手工缝，参照同学们穿的样式来缝。缝好了，我穿着去上学，假装是一样的衣服。其实，他们穿的是缝纫机缝制的，我的衬衣是妈妈用手工针线缝出来的。我能从这里更多体会到妈妈为我上好学校付出的辛苦，这一点，富家子弟是体会不到的。

当然，也有不少同学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可是究竟都还小，还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等级观念，我平时又很注意，所以没有出现过很过分的事情。再加上我很用功，功课好，老师很喜欢我。我靠自己



今日育才
中学，它的前
身是工部局办
的一所非常有
名的中学。